

# 1

## 生产关系理论是一门科学

把生产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首当其冲地要涉及到人们对传统和现行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特别是涉及到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理论学说的认识。事实上，前人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了生产关系研究的起点。

### 1.1 《资本论》是生产关系论

马克思经济学说主要以《资本论》为代表，在历史上、国际上都影响深远。自然，人们对生产关系的认识也主要见之于《资本论》。但是，《资本论》卷帙浩瀚，容量很大，俨然经济学大百科全书。因此，人们也容易各取所需，莫衷一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培兆、孙连成著的《资本论 研究之研究》中提到，“遗憾的是，《资本论》至今还仿佛是一本谜语集，同是一个《资本论》里的原理、观点，总是有许多样的理解，对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见该书第 10 页）有的从生产力方面来认识，以为《资本论》研究的主要是生产力问题；有的从生产方式方面来认识，认为《资本论》研究的是社会生产的具体方式，或者说是用什么、以什么方式生产的问题；

还有的则从商品生产甚至市场经济方面来认识，认为《资本论》揭示了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按比例规律等。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究竟研究什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人们主观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我们不必拘泥于马、恩是否和在哪里对该书的研究对象给出明晰的定义，不必以虔诚的教条主义态度简单地论证某个观点的科学和正确，也不必生搬硬套地寻章摘句为自己的观点加以注释和说明。从方法上，比较客观和公正的，亦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即是马恩研究《资本论》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目的，《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资本论》对社会的影响、轰动和评价。唯有如此，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可靠性而不带任何偏见。并且，有必要申明，本着对科学诚实的态度，著者坦率地承认，我们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活的经历，也缺乏对当今资本主义现实的考察，尽管我们也接触过不少介绍当今资本主义的资料，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主义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认为，这并不妨碍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了解他们研究《资本论》的目的和所要阐明的根本问题。这些不能因时而异、见异思迁。

### 1.1.1 《资本论》的创作动机和背景

一门科学主要对象是什么？首先要看其研究的目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要达到的目的与他研究什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直言不讳，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及历史暂时性，提出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除了作为革命者，亲身革命的实践，还作为科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72 页）不过，马克思献身科学的领域，开始

研究的是法律、哲学和历史，研究经济理论即政治经济学是半路出家。那么，马克思后来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得很清楚，他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这里说的是德国当时正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地主强占了过去一向为农民公共所享用的森林和草场，农民为生活所逼被迫去捡树枝，即所谓“盗窃”林木。马克思在《莱茵报》担任主编期间，在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中，他大胆挺身而出，保护倍受压迫而毫无权利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严厉地谴责地主的罪行，对省议会牺牲劳动群众来满足私利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但是，对于农民因被剥夺财产而出现所谓盗窃，马克思仅是凭着道义，从政治、国家和法的角度提出要保护农民的利益，批判普鲁士的反动制度，批判现存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并没有从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方面揭示出这种不平等的经济根源所在，因而缺少理论的真正力量。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第一等作用，但他也感到自己这方面仅有的知识是欠缺的。因此，马克思决心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中去寻找法和国家的根源，由纯政治领域转向研究经济关系，从而在理论上进入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另一方面，促成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因素，还由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明确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认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只在理性的范围内而没有从人们经济利益关系上诅咒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就是在批判这些思潮

时，他也深感自己由于缺少生产关系方面的知识，“善良的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他提出，要使社会主义建立在坚实稳固的科学基础之上，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就要到被有人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物质利益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在《莱茵报》被封闭以后，就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潜心钻研政治经济学。

那时，马克思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首先接触到的是前人的思想材料和成果，其中主要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由于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的对象也就不同。斯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刚刚取代封建主义的时期，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天然合理的，比封建主义“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斯密在他著名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公开声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为了尽快地发展生产，他精心研究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各种因素。为生产而生产则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所以，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页）他们并没有也不愿触及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这样实质性的带爆炸性的问题。相反，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停滞不前甚至望而却步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揭露资本与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内部隐藏得很深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合理和历史暂时性，指出其终将被一种崭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他们从来也没有准备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部长，所以，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生产

形式和生产方式，更不会去研究怎样为资本主义社会增长财富的问题。如果不研究生产关系，也就没有马克思影响深远的《资本论》。

### 1.1.2 《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及其影响

尽管《资本论》篇幅很长，体系庞大，许多学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哲学的、文学的，以及一般经济学等理论可谓是有应有尽有，但《资本论》的核心和精髓还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并非是一般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包含资本家之间，工人之间等的关系，只是这些关系是从属性的关系，在很少地方提及。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论》就是对于这种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在逻辑上，马克思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们来到市场上，彼此作为不同的所有者，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但是由于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有到劳动力市场向资本所有者出卖劳动力。劳动力买卖即使是以等价交换的形式成交，可是买卖双方的关系、面貌、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语言，“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第200页）

在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指出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并且从

包括分配过程在内的总生产过程来分析，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资本的利息、利润以及土地的地租，都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恩格斯说：“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41 页）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掩盖和抹煞剥削的观点如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251 页）亚当·斯密的资本、土地、劳动“三位一体公式”等，指出“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但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41、244 页）当然马、恩也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不合理，不平等，也就不适应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提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将要被剥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的结论。

正是《资本论》对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即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的揭示，才在整个社会历史上产生空前的、轰动性的影响。《资本论》由于触动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深处的根本利益关系，“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资本论》第 1 卷第 12 页）《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42~543 页）恩格斯在为《资本论》写的书评中指出，“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6 页）。马克思的战友约·菲·贝克尔则说：“《资本论》，这是我们的剑，我们的铠甲，是进攻和防御的武器。”（《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史概述》，山东人民出版社，第 55 页）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莱茵报”作》中指出，无

产阶级把《资本论》“看做自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的最重要的论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36—237 页）因为《资本论》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根源，所以“《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资本论》第 1 卷第 36 页）

完全可以想见，如果《资本论》研究的不是生产关系，不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一般的经济理论，一般的人与物的关系，一般的生产、流通、分配关系，研究一些纯粹属于“技术性”的经济问题，比如“边际效用分析”，“结构均衡原理”等，不仅这方面的成就远远比不上许多技术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在整个世界都毫无地位，更谈不上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 1.1.3 《资本论》与生产关系理论

《资本论》以研究生产关系著称于世。但是纵观《资本论》洋洋数百万言，体系恢宏，也有许多地方与生产关系扣得不紧，甚至是一些与生产关系无关的内容，这也是《资本论》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甚至导致实用主义的地方。而且对《资本论》读的次数越多，这种感觉就越明显。首先，对于著名的劳动价值论，最重要的就是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奠定理论基础。但是在《资本论》中，相当的篇幅谈论的却是价值决定问题，即何种劳动决定价值，何种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诚然，商品价值客观上总是包含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由于社会劳动分配的复杂性，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都使得价值量的计算成为永远无解的哥德巴赫猜想。事实上，在搞清楚价值的源泉

来源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以后，再去追究价值量的决定和计算很可能画蛇添足，是一种多余的无效劳动。另外，在《资本论》中，对今天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价值规律，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偏离，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理解，也相距甚远。在理论上，讲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实践上，人们则认为这个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就是指商品生产第一要符合社会需要，反映供求关系，其次要降低成本，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已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般要求，是商品经济的通行准则，与劳动价值论、生产关系并没有什么内在必然联系。

其次，是西方经济学者争议较大的生产价格理论，本来主要是说明生产价格由价值转化而来，平均利润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剥削无产阶级的关系。可是具体到量的决定上，虽然可以从抽象的角度说明总价值量与总的生产价格量、总利润量与总的剩余价值量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如果过多纠缠于生产价格在量上与价值量的一致，就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毕竟离题，实际上卷入到一场无关本质宏旨的争议之中。至于在现实中人们试图依据生产价格制定价格，恐怕很难有成功的结果。

第三，《资本论》第 2 卷中我们认为跟生产关系理论也偏离甚远。本来《资本论》第 2 卷应该分析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但我们看到，《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属于资本（这里实际上是指作为物的资本，而不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的一般内容，至于两大部类的再生产在许多社会都同样适用。充其量最多提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资本不能顺利循环和周转，社会再生产难以按比例进行。对此，恩格斯曾经提到，《资本论》第 2 卷“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

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一卷定会使人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颇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可是第 3 卷则如同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指生产关系），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427、461 页）

《资本论》篇幅太大，掺杂了许多与生产关系扣得不紧的内容。究其原因，我们分析，一是受当时德国社会恶劣风气的逼迫。那时，德国社会上有一种风气，以书的大小厚薄来评价其意义，书写得越大越厚越被看得起。1863 年 7 月 6 日，燕妮（马克思夫人）写信给马克思海姆夫人说过这件事。她说：“德国人，尤其是那些体面的绅士们，偏偏只相信‘大部头’著作，所以简洁扼要和删除多余部分（指《资本论》这部书）的办法就已经没有价值。”（见《〈资本论〉研究之研究》，胡培兆、孙连成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220 页）二是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在当时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不宜太露骨、太刺激，必须与当时经济学家在一些无关宏旨的学术问题上进行辩论，因此这也容易淡化和偏离生产关系研究。所以，西方经济学者有的也认为马克思是现代有效需求理论的奠基人；有人认为马克思是继魁奈之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形成者，是“现代魁奈”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理论的先驱；有的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父等（见《南开学报》1982 年第 2 期第 7 页魏垠文）在 80 年代，中国也曾普遍学习《资本论》第 2 卷中的再生产理论，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知识的指导。但我们认为，这些一般的经济学知识，尽管对经济发展是有一定实用价值的，有些也是必须具备的知识，不过也只能是《资本论》的副产品，并不能代表《资本论》的全部思想，尤其是有本质意义的思想。不能以此否定《资本论》是生产关系论，更不能抵消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 1.2 彻底消除对生产关系的误解和偏见

实事求是地分析，生产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性，还不仅因为马克思《资本论》是生产关系论，而在于生产关系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必须把这种关系上升到理论和系统的高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基础科学。但是，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的认识，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误解，以及由误解产生的偏见。由此直接影响到这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甚至威胁到这门科学的生命，自然也抑制了生产关系科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指导作用。所以，必须在事关生产关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明辨是非、正本清源，以还这门科学的真实面目，并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 1.2.1 消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误解

人们对生产关系方面的误解，以及由误解产生的偏见，首先来自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并因此削弱了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我们分析，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人们虽然批判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与此同时，在并未真正把握生产关系本质的情况下，错误地把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的失误归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从而急于否认、摆脱和放弃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甚至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视为“左”的思潮。这当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冤假错案”。我们认为，多年来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失误，不仅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原因，而且恰恰相反，是没有始终坚持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生产关系本身研究落后、僵化和脱离实际。长期以来，我们争论不休的是政治经济学

要不要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但对怎样深入研究生产关系却很少涉及。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一是满足于制度性区别。简单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而且这种本质区别主要是来自马克思的结论，比如所有制方面的、生产的、流通的、分配的、消费的，以及经济调节方面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减少了某些方面（如计划经济）的区别，但政治经济学基本上仍停留于一些区别方面。这种区别并不能丰富生产关系研究的内容。当然，这也是人们鄙薄生产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二是把现实生产关系理想化。先人为地从公有制（实际上是马克思结论的公有制）开始，先验地提出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平等互助合作的，规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收入是按劳分配的……似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天然合理的，人们已经生活在天然合理的生产关系之中。但是在客观上，人们在现实中对生产关系的感受与此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容易造成生产关系如同空中楼阁、充饥画饼，因而产生对生产关系的反感。其实，生产关系的先验规定与现实生产关系的差异，只能提醒人们要从现实中研究生产关系，去促进生产关系向理想方面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从书本上、结论上，主观臆想地研究生产关系。当然这并不能作为否定或轻视生产关系的借口，由此产生不合常规的逆反心理。

三是一味强调生产关系的阶级属性。在一度时期里面，人为夸大和歪曲人们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对立和矛盾，尤其把生产关系视为阶级关系，把生产关系矛盾视为阶级斗争，尤其将按劳分配“上升”到需要消除的“资产阶级权利”，仇视商品货币等，从而导致人们厌恶生产关系研究。其实，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否是

阶级关系，取决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有史以来，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并非都是阶级关系，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比如在今天的环境里，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是阶级关系，而是非阶级关系，但谁都不敢由此而妄言说不需要研究。无端地把生产关系抽象为阶级关系，以致于后来因此排斥生产关系，当然只能是一种无知和偏见。（这个问题后面还要具体涉及）

四是借口生产力的重要性，强调在政治经济学中把生产力研究放到首位。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他的历史责任和研究重点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和暂时性，所以没有着重研究生产力”。（《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8 页）言下之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自然就要首先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则可以弃置一旁了。有些人还把我国一度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搞“穷过渡”、“一大二公”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过错。我们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个统一体，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起作用的。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只要研究生产力就行了，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生产关系的研究是生产力研究所根本不能代替的。这些都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借口生产力的重要性而忽视、轻视甚至取代生产关系研究，同样表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认识有着很大的误解和很深的偏见。

其实，关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日本生产力运动之父乡司浩平先生可谓是见解不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般人对提高生产力的认识就是“把新锐的武器替代迟钝的人工，产量由 1000 件增加到 1200 件，便算达到了目的”。从而把这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但当有人请教乡司浩平先生时，他则否定

了上面这种机械性的说法，坚决地说，日本在战后“国破家亡，扶桑全土为联军占领，朝野上下彷徨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全国到处是分裂，是斗争，和平主义者跟军国主义者算老帐，……真所谓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在这样支离破碎一团糟的情况下，如何收拾河山，重谋宁静建国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陈锡礼编《他山之石》第48-49页，西南师大出版社）

### 1.2.2 消除对生产关系本身的误解和偏见

除了政治经济学对象之争产生对生产关系的误解与偏见之外，对生产关系本身的误解和偏见也是导致生产关系研究脱离现实、难以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积极主张研究生产关系的部分学者，对于何谓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现实经济中究意是什么样的关系？许多问题也存而未论，悬而未决。近年来这方面的理论文献越来越少，寥若晨星，研究者形单影只，也充分反映了生产关系研究的不景气和萧条状况。

首先，人们在概念上的认识是一回事，但在具体描述和分析中则是另一回事。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尽管人们大都认为是生产过程中（实际上，新的产业概念的划分，已经几乎把所有人都纳入到社会生产过程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撇开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谈，单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版教科书而言，学者们在具体研究和分析过程中，司空见惯的是脱离生产关系研究一般的经济过程，经济理论中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生产关系，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现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不是大量地塞进部门经济学的内容，如金融信贷、商业流通等，就是把政治经济学教材变成经济运行分析或微观经济学加宏观经济学的总汇，如讲企业的成本、价格、赢利，以及企业的资金循

环和周转，还有总供给、总需求、国民收入、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就业量与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经济总量的分析等。（蒋学模教授批评了这种现象。见蒋学模著《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辅导材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8页）当然，著者不是否认这些问题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但部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分析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把这些都纳入到生产关系中来，只会使生产关系研究偏离本质，迷失方向，磨灭锋芒，从而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事实上并不利于生产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只会葬送这门科学。

其次，在对生产关系内涵的理解上，也相当肤浅。近些年来，似乎“四环节说”（主张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阐述的经济运动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构成的理论来研究生产关系）占了上风。尽管一些编写者们在前言部分里也提到要研究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交换过程中的关系、分配过程中的关系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但是纵观全书，往往看到的仅是一般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生产与消费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很难看到人们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分析，与人们接触到的利益关系相距遥远，好像都是些一般的经济学常识，要么就是一大堆空洞无物、泛泛无味的说教。如讲生产是起点，是前提，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四个环节不可分割联结在一起。讲生产是根据公有制来推论演绎生产的实质、目的，再就是分析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合理配置等问题；讲流通只是提出流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然后就讲资金的循环和周转，描述资金和商品的流通过程；分配从再生产的性质开始，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讲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消费品的分配，应该说分配本身与人们的利益关系相当密切，可是由于脱离实际，人们在现实分配方面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远未揭示出来；消费则大量的是消费的技术性问题，更看不到有多少人们相互关

系的分析。其实，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十分丰富、十分生动的，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生产主体、流通主体、分配主体、消费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很多需要分析的矛盾和问题。（这些在下面都将具体分析）可是在现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却十分苍白乏力，无论如何都难以满足人们对现实经济关系研究的要求和愿望，生产关系研究变成了一般的经济现象关系研究，以至于在许多重要问题和矛盾的分析方面就显得往往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抓不住本质，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

### 1.2.3 轻视生产关系这门科学的严重后果

生产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由于人们诸多的误解和偏见，使得生产关系理论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当然经济实践也缺乏相应的科学指导，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缺乏明确的方向，进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从理论上说，冷漠和轻视生产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经济学至今尚未走出误区。一批经济学者（主要是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者）出于偏狭的认识，似乎以为研究生产关系就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因而生产关系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人丧失了热情和积极性，队伍越来越小。一些生产关系理论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几乎招不到弟子，许多本来研究生产关系问题的学者，纷纷转而研究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或其他学科。当然，生产关系理论研究本身的“难关”、“禁区”，也可能令人望而却步，转而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避而远之。综观生产关系研究的现状，不仅研究者寡，就其水平而言，也是一般泛泛，内容肤浅，枯燥无味，死气沉沉。不是简单的制度对比，就是在实证不能证实的前提下盲目规范，再就是一味作政策诠释，

千万遍重复一种观点，而当政治和领导人观点重新变化时，又不得不跟着出现新的注解。事后诸葛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可谓屡见不鲜。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总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马克思当时出于研究的特殊革命目的，只要揭示出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就够了。但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以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目了然，或者只是简单地分析政府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具体深入分析政府与部门之间、各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以及非经济部门、事业单位之间纵横交错、蛛丝密布的关系，特别是以人为中心、为纽带联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许多经济生活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难以得到科学的说明和解释。尽管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很少有人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论证和说明。必须承认，生产关系研究总的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也正因为如此，至今生产关系研究才很不深入和系统，生产关系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体系都不甚明确，生产关系科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著者看到即使是标明以刊载政治经济学文章为主的刊物，其专门研究生产关系的内容也如凤毛麟角）

在实践上，忽视生产关系研究也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把生产关系等同于所有制。（把所有制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把所有制形式的“升级”和“穷过渡”当作是生产关系的进步，认为全民优于集体、集体优于个体，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县联社，盲目“一大二公三纯”，要求太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结果大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以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得不实行农业大包干，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对农民家庭拥有生产资料，引起所有制形式变化的情况，理论上并未作出生产关系的解释，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阴魂不散、幽灵徘徊。

尤其是一批个体私营企业戴着假“集体”的“红帽子”，这也表明所有制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明不白。

其次，生产力发展仍然受到生产关系的阻碍。按照人们通常的观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生产关系是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生产力发展似乎是自身的科学组织问题。但是，在后面的研究中，读者们将不难发现，消灭了剥削者和剥削制度，仅仅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步，或者说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诚然这是重要的一步。问题的实质是，在全体劳动者之间是否建立起能充分调动起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生产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在现实经济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一系列交往关系是否令人协调融洽，心情舒畅，真诚以待，从而焕发出内在的热情，认真负责、全力以赴去从事生产劳动？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在调查中感到，至少有相当比例的人们都会亲身感受到自己积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未调动起来，自己的能力、潜力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并未充分发挥出来。经济学者们经常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作预测论证，却鲜见对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分析，而恰恰在劳动者身上蕴藏着无比巨大的能量和潜力，这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所在。说得再具体一点，这些年人们讨论较多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工作应该说做了不少，但收效并不明显，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有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来启动，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引起人们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如果忽视和绕过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就要遇到利益关系的障碍，使得调整很难功成圆满。当然，类似的事情还很多，这里无须赘述。

再次，轻视生产关系研究的严重后果，就是改革缺乏细致的生产关系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大了改革的难度和成本。改革作为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其实质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应